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民族史译文集

6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历史研究室资料组编译

一九七八年

新民族史译文集

11(219/1)

目 录

高地亚洲.....〔法〕伯希和（1）

铁勒考.....〔日〕小野川秀美（29）

温昆河碑文中的康居民族地名考...〔苏〕С.Г.克利亚什托尔内（63）

回鹘文化与风习.....〔苏〕Д.И.吉洪诺夫（81）

介绍几本有关突厥史地和语文研究的西文书.....魏治臻（114）

高地亚洲

〔法〕伯希和 (P. Pelliot)

〔译者按〕：伯希和氏为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中央亚细亚历史、语文专家。1906——1909年曾率法国考古队到新疆进行发掘工作。一生中（死于1945年）著述甚多，仅论文即达四百多篇。此小册子原题作La Haute Asie（高地亚洲），为1931年法国 Citroen 中亚考察队出发前伯氏对该队所做的报告，同年在巴黎出版。书中高度概括地介绍了中央亚细亚两千年的历史，对我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由于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他对某些问题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应给予批判。译文对书中个别不太重要的地方略有删节。

中央亚细亚这一有巍峨雪山、流沙、气候严酷（ $+40^{\circ}$ —— -40° ）的广大地区（约七、八百万平方公里），只有七、八百万人口。在这一地区，历史上未产生过什么伟大的文明，将来也预示不怎么样。半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为什么吸引了这么多的旅行家和学者？蒙古地区使人回忆起成吉思汗的业绩，西藏则唤起人们对巨大山脉和神秘喇嘛教的想像。难道说那里只有幻景和语言的咒术吗？30年来，各大国科学考察队特别在其名字并不十分诱人的新疆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工作。在粗略研究这块如此广大、以前不太为人们知道的地区的现状和历史后，我们知道那里应有一些其它什么更复杂、更深刻的东西在吸引着人们。

所谓中央亚细亚，包括三大政治区，它们在地理和人种上大致相当于三个不同的地区：即蒙古、新疆和西藏。

蒙古（约270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左右）基本上为牧区，分为外蒙（在北）和内蒙（在南）两部分，中间为荒漠的戈壁。蒙古人（其语言像突厥语一样，属“阿尔泰语系”）现为佛教徒——西藏的喇嘛教派，但存有古代萨满教的许多残余。1911年当中国革命时，外蒙（十七世纪以来属中国）宣布在库伦（Ourga）“活佛”治下的自治。从1921年，特别是从1924年后，成为俄人控制下的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内蒙（其重要性小些）则仍属中国。中国在那里的殖民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中国属突厥斯坦或称新疆（从1882年改为行省），面积约170万平方公里，人口至多为250万左右，大部分为伊斯兰教，语言为突厥语。只是在由天山大的内容谷构成的平原上，居民才定居，从事农业，如肥沃的吐鲁番凹地，伊犁河谷以及塔里木盆地绿洲。塔里木这个面积几等于法国的低地，为一向东北倾斜的巨大盆地，北、西、南为天山及喜马拉雅山的西脉所包围（某些山峰高达七千多米），降雨量很少，植物只是在冰雪融化形成的河流处生长。由于气候十分干燥，蒸发快，加之土地的吸收和灌溉用水所需，河水很快就耗尽了，剩下的没入沙漠。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上的绿洲像两条带子一样，沿着高山伸延。地理上的分割导致政治的分割。历史上塔里木盆地的“诸国”都是地方性的，统一多由外族征服者（汉人、突厥人、藏人）完成。塔里木河长2,750公里，流入罗布泊（Lop-nor），由于河沙淤积，它曾多次改道。

西藏，约300万平方公里，多大山，其中南边（靠印度）的喀喇昆仑山高达8,000米，喜马拉雅山高达8,840米或可能为8,900米（埃佛里斯峰）（即珠穆朗玛峰——译者）。北部和西北部（与新疆接壤）平均高达5,000米。气候酷烈，有的地方盛夏时夜间也结冰。居民只住在西南部、南部和东部，这里谷地降到2,000米或2,500米，出产小麦、大麦，甚至大米、杏、葡萄，如西南部的拉

达克，南部的布拉赫马普特尔谷地及东部靠近中国内地的地区。藏族人口约二、三百万，其中六分之五定居。藏语与缅甸语相近，组成汉藏语系的西支，而汉、泰语则为东支。

从七世纪起，藏人成为佛教徒，但为喇嘛教派，并混有当地原始宗教的成份。

中央亚细亚位于地中海和印度及中国之间，它在地理上的重要性在于它既将上面三个地区分开，同时又把它们联结起来。交通十分不便。北为沙漠分割的无际草原，西面在塔里木盆地和俄属突厥斯坦之间隔有通行困难的峡谷，西南方通路一年中大部分不能通行。南面喜马拉雅山虽有几个缺口，但要穿过通行困难的整个西藏。东面则为可怕的流沙。这三个地区并不像不久前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从远古时代起其间就存在过联系，有过相互的影响。不过依时代不同，这种联系与影响的程度不同，但从来未曾间断过。

※ ※ ※

过去流行一些幼稚和错误的说法，说是“世界屋脊”是人类的摇篮，人类是凭重力律下自帕米尔的，梵语是世界语言之母，以及什么古人类从没有生活在从印度到（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一线以东的地区，中国不存在石器时代，雅利安人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到达印度，在此之前，当地人民和雅利安人本身都没有文字，文字只是在公元前几世纪时才偶然传到那里。中国只是在公元前第二世纪的末期才与西亚和印度有了往来。蒙古利亚只是在其游牧民侵入中国北部时，才于公元后的民族大迁移中进入历史，等等。

现在我们应完全摒弃上述这些观点。

在印度，印度河流域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公元前三千年的非雅利安文明的出土文物，它们在雕塑艺术方面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使用一种与（前亚）苏美尔（Sumérienne）古文字很相似的文字。对中央亚细亚研究来说，不能忽视这些发现，因为有人认为苏美尔语与

“阿尔泰语系”有亲属关系。

中国方面，李桑 (Licent) 和塔依勒哈尔德·德·夏尔旦 (Teilhard de Chardin) 神父几年前在河套发现了旧石器用具。最近又发现了北京猿人 (Sinanthropus) 的残骸。它介于爪哇 (Java) 的爪哇猿人 (Pithecanthropus) (还很难算作人类) 及 (西方) 尼安德特人 (Neanderthal) (这是欧洲发现的最古人类) 之间。这是就旧石器时期的人类而言。至于新石器或 chalcolithique 人 (即细石器或已开始兼用青铜器的人) 的遗址在华北已发现有十多处之多。在蒙古、西伯利亚、东西突厥斯坦的许多出土品中，其陶器与西亚和东欧的型制似有联系。青海和中亚新石器遗址中发现了海贝 (cauries)，说明曾存在过产品的远途运输交换。既然这些新石器人之间进行了产品和技术交流，那自然也应有仪轨 (pratiques) 和信仰方面的相互影响。今后的任务是确定古代世界乃至现在的古文明中新石器时期的共同底层为何的问题。

※ ※ ※

关于中国与西亚的最初交往和蒙古利亚进入世界史的传统看法，现在要加以修正。我们切不要受现在地理名称的欺骗。公元前最末几个世纪中，蒙古利亚可能不是蒙古人的住地，突厥斯坦可以肯定不是由突厥人居住的。

公元前第三个千年 (可能还包括第四个千年)，在南俄草原和西伯利亚西部无疑有一可能属于印欧系的草原文化，是这些草原部落首先学会了骑马，之后西南传入高加索和伊朗，东南则传入中国。这些草原部落不知文字，是他们创造了可称为游牧民艺术的古老的动物艺术，把原先在皮子或木头上做成的型式雕在青铜器上。

公元前几世纪时，上述草原地区为塞人 (Scythes) 所占，之后为萨尔马特人 (Sarmates) 所占。现在一般认为他们是印欧种人，

属伊兰系的游牧民。与他们相近的一支后在波斯建立了定居的阿契美尼德 (Achéménide) 帝国。那时候印欧人种的部落曾延伸到以前人们想像不到的更靠东的地区。近三十年的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都说明, 他们不仅曾游牧于整个天山地区, 还曾构成今新疆的全部定居民, 并曾占有甘肃的西南的一部分。

现在很难具体指明, 印欧伊兰系的游牧民 (或可能为半游牧民) 当时在西伯利亚中部和蒙古高原曾延伸到什么地方。公元前二世纪初, 在蒙古已有中国称之为匈奴的部落联盟。这个写法是新的。其名字与此不同的写法至少在此五百年前已出现在中国文献中。一般认为匈奴就是民族大迁移时期欧洲人所称的Huns人。他们不是印欧人种。现在认为匈奴或Huns属突厥 (turc) 系, 这点几成定论。突厥这个名称虽来源于一个形容词, 但尚不能解释。匈奴的统治层虽说是突厥人, 但不能说匈奴或Hun联盟内部不包括伊兰人成份。总之, 中国北部的这个游牧民族很早就已受到伊兰文化的影响。这方面汉文史料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证据。

中国早已知道用马驾车, 但不骑用它。为了防止游牧民的入侵, 中国曾修筑了墙垒。公元前三世纪末, 秦始皇把它联成为著名的长城。但这是一种消极的防御。公元前300年左右, 中国已采用骑兵对骑兵的办法。为此, 把中国古老的长袍、鞋和短剑换成游牧民的长裤、皮靴子和长剑。之后, 经过变化已成为汉人的通常服装和武器了。匈奴人的这种装备又是很古借自古代伊兰人。为此, 当我们在公元初中国制的丝织品中看到如萨珊王朝 (Sassanide) 波斯文物中的疾驰回首拔“安息箭” (tirer la “flèche du Parthe”) 的战士图案时, 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 ※ ※

依据中国的传统说法, 中国是在下述情况下与中亚发生联系的: 公元前二世纪, 在中国西部甘肃有汉人称之为月氏的民族,

曾受到匈奴的侵略。中国皇帝打算与月氏联盟夹攻匈奴。于是派张骞出使西域。可是月氏在败于匈奴后，经过新疆迁到了索格底亚那（Sogdiana），之后又迁到大夏（Bactria），到今俄属突厥斯坦的南部和阿富汗的北部。张骞被匈奴拘留十年后才逃出，到达月氏牙帐。但此时月氏人已安于新居，不欲复仇了。张骞在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拘留一年，后同一匈奴妻子和一同伴回到了长安。张骞这次出使虽未完成任务，但从中亚带回了葡萄和苜蓿。这是公元前126年的事情。中国人和欧洲人都把张骞看作是开辟“西域”之路（即“丝绸之路”）的人。通过这条经过新疆的道路把中国的丝绸运到西亚的提尔（Tyr）和西顿（Sidon）等地。

张骞西域之行确有其事。但我认为这个故事不是像人们相信的那样古老，并且有些被美化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包括史前时期的接触或通过中间民族的交换）可能更要往上追溯二百年。人们注意到公元前四世纪中国在哲学、科学等方面似吸有新的空气。早在这个时期，中国文明中已见有来自希腊和印度的影响。中国不出产狮子。公元前一世纪他们通过波斯知道了这种动物，当时用的是伊兰语名称。但实际上中国人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已知道这种动物了，那时使用的则是印度语的名称。

思想和物产是通过哪条道路借入的？不久前人们只考虑经过新疆的所谓“丝绸之路”。如要去印度，先要绕个大弯子去大夏或通过喀喇昆仑。现在在西部天山之北，即在伊犁地区发现了属于公元前约四百年的波斯波尔（Bosphore）钱币。人们自然要提出问题：经过天山以北草原的道路及经过戈壁南北的道路是否也是通往希腊的路线？至于通印度的道路，我相信中部西藏在公元初尚未被认识。人们曾错误地把发现从恒河中流经过拉萨去中国道路的功绩归于（希腊的）托勒密（Ptolémée）。实际上这条道要更靠东些，即经过阿萨姆和缅甸高原。这样，亚历山大的地理学记载才能和中国

材料吻合，可能这条道在此若干世纪前就已被使用过。

不管怎样，确定无疑的是：在公元前后，西亚和远东之间已有了联系，并且这种联系日益加强。首先是强大的汉朝有力量进行对外的行动。之后同样这样做的有唐朝以及蒙古人和满族人。

对于经过北部草原的这条道，如无十五年前外蒙库伦北诺颜乌拉（Noï n-Oula）的发现，我们是毫无所知的。那里发现的墓塚应属于匈奴首领，出土的诸如毡子、皮货等都保存的很好。两块汉文碑说明它们属于公元初。除游牧民艺术品外，尚发现有丝织品、漆器、汉玉和伊兰风格的装饰品以及应为来自黑海的、希腊影响很明显的织物。这些证明古代有经过北亚把地中海与远东联结起来的商业。

但是“丝绸之路”毕竟是主要的商道，同时也是艺术和宗教传播之道。

由于各国考古队在新疆发现了大量的壁画、雕塑和死语言的文献，这一点变得更清楚了。在公元初几个世纪，塔里木北部绿洲和吐鲁番地区为有棕色皮肤、兰眼睛、说一种我们称之为“吐火罗语”的印欧种的居民所居住。这种“吐火罗语”构成印欧语系中特殊的一支。它在某些方面比起梵语和波斯语来更近于斯拉夫语和凯尔特语（celtique）。塔里木盆地南部绿洲则使用另一种印欧语，即属于伊兰语支的（和田）塞语（Çäka）。最后还有一种也是已消亡的伊兰语——粟特语（Sogdiane 人的语言）。由于操粟特语民族的商业活动，这种语言成为当时中亚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中国从张骞通西域后就数次派军队到新疆，建立军屯，并于公元前一世纪中期正式统有该地。

从中国西部甘肃迁到粟格底亚那和大夏的月氏人很可能也为印欧种人。他们是否讲“吐火罗语”或塞语，并且吐火罗一名（他们带去这个名字并使大夏后来称为吐火罗斯坦）是否从一开始就指现

在我们用此名所称之语言，这是个长期争论尚未能解决的问题。但月氏族（另一组 Indoscythes 人）应与新疆某些居民有密切的亲属关系。

到达大夏的月氏人（或 Indoscythes）曾前进到印度河流域，并继承了亚历山大远征后存在那里的希腊王朝，与波斯，安息（Partes）和粟格底亚那的伊兰定居民发生了联系。当源出印度恒河流域的佛教在西北方越过印度边界时，月氏人皈依了佛教。但佛教传到这里已被打上很深的伊兰成份的烙印。这表现在具有希腊艺术传统和模式的（佛陀）塑像中。这种伊兰式的佛教和“希腊——佛教”艺术通过月氏人传到了新疆。以后，从公元后一世纪又传到了中国。从那里再传到高丽和日本。这是世界史上的大事，因为远东（它初次认识佛教要归功于月氏人）现构成释迦牟尼信徒的绝大多数。实际上我们知道，译佛经为汉文的第一批译者几乎都是月氏人，安息人或粟特人，也就是说都是伊兰人。真正印度出身的人只是很后期才参加了汉文译经的工作。艺术史不能忽视希腊——佛教艺术。其影响明显表现在新疆的壁画和雕塑上。伊兰成分稍后为印度笈多（Goupta）艺术的影响所改变。这一点尚见于五——六世纪中国北魏的佛教艺术中。当这些外来成份为中国吸收、融合和再创造时，就成了我们所见的敦煌、云岗和龙门的雕塑了。

※ ※ ※

公元前二世纪崛起于蒙古高原的匈奴游牧帝国的命运是短暂的。不久就分成几个部分。西部匈奴在西部西伯利亚作了长期停留后重新获得了力量，于五世纪成为在欧洲史上叱咤一时的阿提拉（Attila）的匈人（Huns）。而东部或南部匈奴则不断对汉族地区进行掠夺，其中一些部落定居了下来并被汉族所同化。公元后三世纪起，由于边防松弛，中国再次成为贪婪游牧民的猎获物。这时期

是北中国各个王朝混乱的时代，而西方的罗马帝国这时也处于相同的情况下。

所有这些外族不全都是突厥人（如匈奴那样）。虽然其具体族属我们不得而知（而语言的相同也并不等于人种的相同），但到公元初，位于中国北部的“阿尔泰”系的部族包括下面从西到东的三大组：突厥——他们人口最多、最强、最开化，基本上占有整个蒙古利亚；其次是蒙古人，占有蒙古的东北部和满洲西部；最后为满洲的通古斯人（Toungous）。他们都曾在历史上建立过成为中国正式王朝的政权。例如五——六世纪的北魏。人们通常认为他们是属于通古斯系的民族。但实际上他们是操突厥语的民族。再如后来十——十一世纪的契丹，十二——十三世纪的女真和十三——十四世纪的蒙古人。最后是满族人。从公元初起，北部中国有一半时间是受异族统治的。

继匈奴之后的游牧帝国（也领有古匈奴联盟之地）为蠕蠕（柔然）或欧州人所称之阿瓦尔人（Avars）所建立（公元407—553年）。他们可能是侵入欧州的、后为查理曼（Charlemagne）所吞并的阿瓦尔人的祖先。根据语言学上的材料，我长期认为蠕蠕（或阿瓦尔）不是像匈奴人那样为突厥人，而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由操蒙古语族语言的人建立的国家。我还认为他们的亲族（cousins）白匈奴或称嚙哒（Hephthalites）（此族于公元500年左右到达了阿富汗并对西北印度进行了侵掠）也是蒙古系的民族^①。此外，吐谷浑也应为蒙古系的民族。他们于四世纪初迁到甘肃的西南部和青海地区。其王国于公元663年为藏人所灭。我认为是吐谷浑和柔然（蠕蠕）最先使用“可汗”（qaghan）这个称号称其首领的。这个词（或其变化的形式——“汗，khan”）后来为突厥和蒙古人所采用。

^①据近年德国奥·韩森（O. Hansen）的研究，嚙哒语属印欧语系伊兰支（至少就书面语而言）。

——译者

虽然〔北〕魏创有文字，但没有留下其语言的任何文献。柔然的情况也是这样。后来，建立北魏的鲜卑人与汉人融合了。柔然后为突厥所灭。突厥原为柔然在阿尔泰山一带的锻奴，于公元551年起来反抗，并取代柔然建立了强大的突厥汗国，首府位于外蒙的鄂尔浑（Orkhon）河近处。

汉文史籍上的突厥一词应为türk（强有力之意）这个词的蒙古（柔然）语的复数形式Türküt的译音。这是“突厥”（Türk）一词在历史上的首次出现。突厥人首先征服了柔然领下的蒙古成员以及所有操突厥语、但不以这个名字称呼自己的部落。在不到十五年的时间里，它不仅领有整个厥古，并扩展其势力于新疆、伊犁、俄属突厥斯坦和阿富汗北部，并且和拜占庭、波斯萨珊王朝以及中国有过使节往还。

六世纪末起，突厥汗国实际上分为独立的、并经常处于敌对状态的东西两支。建牙帐于鄂尔浑河流域的东支存在较久。它于745年为另一支突厥人——回鹘（维吾尔）所灭，后者于840——841年又为同属于突厥系的黠戛斯人（Kirghiz）和葛逻禄人（Qarlouq）所取代。之后在蒙古草原再没有出现过大的突厥政权。

回鹘人离开蒙古后在新疆吐鲁番地区重新又组织起来。在新疆突厥语逐渐战胜当地印欧系居民的古代语言。

西突厥的后代占有俄属突厥斯坦。

突厥游牧民曾前进到西部西伯利亚、南俄草原和匈牙利。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详谈这个巨大震力的辽远反响。但应提到十世纪在阿富汗建立的马哈木（Mahmoud）的突厥王朝（即哥疾宁 Ghaznévide 王朝）以及小亚细亚的塞尔柱（Seldjoucides）突厥王朝，最后还要提到奥斯曼（Osmanli）突厥人的业绩，他们于公元1453年攻下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突厥汗国因他们留下的碑文而为我们较好地知道。在蒙古高原

留有突厥诸汗的巨大墓志铭，用几种语文写成。其中之一为古代突厥语，用所谓“如尼（runique）”文（它源自粟特文的古老形式）写成。碑文用语质朴，描述了诸可汗的事迹。另外有回鹘人在新疆留下的回鹘文文献，大多为翻译作品。关于回鹘文，人们常说是来自景教徒使用的叙利亚文的“福音体”（estranghelo）。其实这种文字来自后期粟特文。而古期粟特文又源自阿拉美（araméenne）的赛米特（sémitique）文字。这种文字外形上近于叙利亚福音体文字，但不是来自它。后来的蒙古文、满文又来自回鹘文。就这样，腓尼基人（Phéniciens）发明的字母（它也是欧洲字母的来源）一直传播到了太平洋沿岸。

* * *

东突厥汗国（蒙古高原）和西突厥汗国（天山及东西突厥斯坦）的灭亡，部分原因是由于游牧民族内部的纷争，但更主要的要归因于中国的外交和军事行动。到六世纪末，分裂达两个世纪的中国又重新统一在强大的唐朝统治下。唐帝国一个时期曾统有中亚和东亚。唐朝的大军曾挺进到乌浒水（Oxus，今中亚阿姆河）。被阿拉伯人逐出的波斯萨珊王朝的王子向唐政府求救。为印度王所怠慢的中国使节在藏族随从人员的帮助下俘获了该印度王，并把他带到中国朝廷阙下。

但到了八世纪中期，经过长期繁荣后，中国国内发生了危机。为了镇压暴乱，大唐帝国不得不求援于外族雇佣兵（突厥、伊兰甚至大食兵）。但新的威胁又迫在眉睫，藏族人在其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走出群山，成为中亚政治舞台的主宰。

目前我们对藏族古代史不太了然。公元初藏人的一些部落居住在中国的西部边疆，如甘肃南部和四川西部。当七世纪上半期，其首领松赞干布娶了汉（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公主（这表示西藏在中

国和印度两方面影响下未来的进步)并皈依佛教时,藏人住在拉萨地区已有若干代了。

松赞干布后的继承人断断续续地实行了与唐朝友好的政策,同时逐渐扩大其疆界到中国的西部和新疆。藏族的一支军队曾一直推进到蒙古并一度进入唐朝的首都——长安。最近发现的一个文献表明,当时西藏人的地理知识曾达到离其本土很远的地方。我这里指的是属于九世纪的一个写本,即为回鹘突厥统治者撰写的一篇报告的藏文译本。写本描述了从高丽到乌拉尔一带的中亚各族。

对中国来说,幸运的是吐蕃是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由于内部的纷争,从九世纪中叶起,藏人又重新退回山区,不再在亚洲军事、政治舞台上起什么作用了。

但西藏人在宗教上取得了成功。在那里形成了佛教的变种——喇嘛教(盛行咒术和魔法)。喇嘛教比起中国的佛教来更适合游牧民的口味,到中世纪末朝,蒙古人也接受了这种宗教。拉萨至今仍是蒙古高原的蒙古人、外贝加尔湖布里亚特蒙古人和伏尔加河下游卡尔梅克蒙古人(厄鲁特)的宗教圣地。

佛教是经过新疆传到远东并成为国教的唯一外来宗教。但几个世纪后,其他宗教也经过同一道路传入中国。虽其成就比不上佛教,但也不容忽视。

三种宗教久已不见,即犹太教、祆教(mazdéisme)和伊斯兰教。

犹太教,在新疆西部曾发现有波斯语犹太文献。我在敦煌得有约属公元800年的希伯来语的写本,即一本萨马里教团(Samaritain)的祈祷书,它无疑是因商业活动带到中国边地的。九世纪后在广州也有犹太教徒,他们是由海路来的。公元1100年左右在开封府建立的犹太教徒居留地,其教徒也同样是由海路来自印度,并且几乎一直存在到现在。我们还知道十七世纪在甘肃宁夏(原文如此——译

者)曾有过一个犹太教堂(synagogue)。这里的犹太教徒显然是经中亚来的。犹太教徒在中亚和中国历史上没有起过什么作用。

祆教(即拜火教),关于这种宗教的材料更少。穆斯林史料中说它曾流行于吐鲁番的回鹘人中。此外,汉文史料提到有几个火天祠(temples du dieu céleste du feu),提到Zoroastre,并说它于公元621年传到唐的首都。我认为祆教从六世纪起已传入中国。但目前不论在新疆和中国内地都没有发现祆教文献。

伊斯兰教是最后传入的。十一——十五世纪新疆逐渐伊斯兰化。在那里伊斯兰教圣地往往就是古代的佛教圣地。从十二世纪下半期起,伊斯兰教已传入中国内地。现有几百万信徒。伊斯兰教在远东的传播似与蒙古时期的军事行动和他们采取的开放政策有关。但其详细历史不太清楚。

另外为摩尼教和基督教。关于这两种宗教我们知道得多些。

摩尼教为巴比伦人摩尼于三世纪创立的二元论(dualiste)的宗教。其基本教义为善与恶、明与暗的永恒斗争。它们各有其领域和神祇。过去这种宗教传播得很广。四世纪末盛行于非洲。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曾信该教九年。后摩尼教受到基督教的迫害。稍后该教分为不同的教派。人们都知道Albigensis战争的残酷程度。在东方,摩尼教则受到伊斯兰教的迫害。摩尼教并曾传布到地中海世界。以前我们只是从其论敌那里才稍知其圣典和教义。

摩尼教在其创立后的二、三世纪时传入中亚和中国。七世纪时传到中国,并且有几种主要摩尼教文献被译成了汉语。一个意外的事件有利于该教的传播。762年回鹘出兵助唐平定(安史)叛乱。当他们占领唐之东都(洛阳)时,在那里遇到摩尼教高僧,并将他们带回鄂尔浑河。从此摩尼教被宣布为国教(在此以前回鹘人中行萨满教)。从此摩尼教在中国和中亚的命运与回鹘人连在一起了。因为回鹘的关系,中国给予摩尼教以许多优待,允许在各处建立摩

尼寺。840——841年回鹘汗国一亡，中国皇帝就于843年下令禁止摩尼教。845年开始迫害所有外来宗教。佛教由于根基深厚，很快就得到恢复。而摩尼教此后再未能恢复到843年以前的状况。但它也未完全灭亡，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象在西方摩尼教受到迫害后曾以Cathares和Vandois教派的形式残存下来一样，摩尼教的二元论教义曾对中国素食教派产生起过作用。后者在中国东部和东南部，特别是在浙江、福建曾有过很大影响。这种摩尼教徒也曾对中国十二世纪的哲学学派起过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也为福建人。两种摩尼教著作于1019——1025年甚至被编入官方的道藏中。几年前新发现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一章说明，在十三世纪末摩尼教徒在福建仍结合有巩固的教团，甚至到十七世纪初仍存在该教的踪迹。

蒙古高原的回鹘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重要的摩尼教碑文。840—841年回鹘汗国亡后，回鹘人又在吐鲁番地区建立了新的王国。德国考古队在那里发掘出各种文字和语言的摩尼教文献（除摩尼教内容的壁画和工笔画外）。敦煌也发现有汉语和突厥语的摩尼教文献。这些发现也证明十三世纪欧洲旅行家鲁不鲁克（Guillaume de Rubrouck）说蒙古人中有“二元论宗教异端”的说法。在中亚，摩尼教消亡在中国摩尼教之前。它为伊斯兰教所消灭（如同佛教被消灭那样）。

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基督教（其中的景教派或称聂斯托里派）在中亚也曾流行过。聂斯托里（Nestorius）——君士坦丁堡的大教长——于公元431年为叶非斯（Ephèse）宗教会议判处死刑。原因是他主张基督不仅有两种属性，而且具有两种人格，即具有神和人的属性。在这里我们无需研究伊斯托里在多大程度上要对这一理论负责。只要指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教派拥有这样多的信徒就够了。这一派基督教在地中海地区受到迫害后、在波斯萨珊王朝得到了避难所。从五世纪起，景教教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波斯的国教教会。

在西方景教得不到发展后，就转而向东方发展。在印度该教合并了自认是圣·托马斯（Saint Thomas）信徒的教团，并开始往中亚派出传道士。我们不知道该教何时传入新疆。但现在确知的是（据汉文史料和1623或1625年在西安发现的属于781年的叙利亚一汉文碑）：635年景教教士阿罗本等已到达唐朝首都。三年后皇帝下令为其建寺。781年的碑文（译者按：即大秦景教碑）详述了一个半世纪中景教在中国所经历的盛衰。我在敦煌发现的文献，特别是其中的“圣三位一体赞”（Eloge de la Sainte Trinité），又给我们补充了一些材料。845年的禁止外国宗教的敕令给了这个信徒不多、教职人员又多为外国人的这种宗教以致命的打击。佛教在禁令后又逐渐得到了恢复，摩尼教也改头换面残存了下来。但845年后三百年间，对中国的基督教就不能那样说了。十二世纪时，我们在最北方发现它是非汉人的宗教。这时已是蒙古人崛起的前夜了。那里的景教徒与中国的古老教会无任何联系，他们独自重振了中央亚细亚的景教教团。

穆斯林和汉文史料都谈到十世纪时在新疆各地有基督教存在。这次又是德国考古队在吐鲁番地区发掘出许多该教的写本，但材料不多。只说明该教在当地的定居民中存在过，而在游牧民中十三世纪时则有更多的景教徒。正是在这些游牧民中我们能考察其传布情况。

所幸，一叙利亚文文献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详情。编年史家Bar Hebraeus保存了1009年一封信的主要内容：谋夫（Merv）（在伊朗）大司教（archevêque）曾要求景教教长对新入教的突厥族克烈部（Keraït）在斋戒上要宽大些。这里克烈族名似为第一次出现（如果不是Bar Hebraeus自己加上去的的话）。约二百年后，我们知道他们是居住在鄂尔浑河地区的一个大部落。其首领曾帮助过成吉思汗（最后为成吉思汗杀掉）。我们还知道十三世纪时克烈部确为